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莎士比亚绎读

Readings of Shakespeare

刘小枫 甘阳◎主编

Shakespeare's

莎士比亚请求观众原谅自己的罪过，  
那就是他过于明确地表露了不朽这一真相。



## 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

[美]伯恩斯 Timothy W. Burns◎著

袁鹏◎译 张霄◎校

然而，在这个倾向于遗忘不朽的时代，  
我们恰恰要感谢莎士比亚的这项“罪过”。

华夏出版社

Political Wis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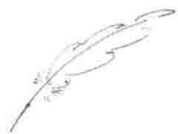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莎士比亚绎读

Readings of Shakespeare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 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

Shakespeare's Political Wisdom

〔美〕伯恩斯 Timothy W. Burns | 著

袁鹏 | 译

张霄 | 校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 / (美) 伯恩斯 (Timothy W. Burns) 著; 袁鹏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7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Shakespeare's Political Wisdom

ISBN 978 - 7 - 5222 - 0094 - 1

I. ①莎… II. ①伯… ②袁… III. ①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 - 1616) - 戏剧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561. 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17202 号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Shakespeare's Political Wisdom by T. Burns, edition: 2

Copyright © Timothy W. Burns, 2013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Springer Nature America, Inc. .  
Springer Nature America, Inc.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shall not be made liable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20 - 3191 号

## 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

---

作 者 [美] 伯恩斯

译 者 袁 鹏

校 者 张 霄

责任编辑 李安琴

助理编辑 朱绿和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2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25

字 数 264 千字

定 价 79. 00 元

---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 “莎士比亚绎读”出版说明

据译界前辈戈宝权查考，1856年，英籍传教士慕威廉翻译出版《大英国志》（上海墨海书院印行），国人首次得知西域有个名叫“舌克斯毕”的伊丽莎白皇朝文人——“莎士比亚”这个译名则最早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国甲午战败之后不久，英籍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1896年，上海著易堂书局版）详细介绍了莎士比亚——其时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改制压力。清末新政时期，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出版（1904，收入“说部丛书”第一集）；革命党人推翻帝制行民主共和之后不久，初版的《辞源》（1915）已列入“莎士比”词条；随后不久，林纾出版了以文言小说体翻译的莎剧四卷（1916）……“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翻译莎剧成为我国新派文人的最爱，1930年，经胡适之倡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成立了“莎剧全集翻译会”……据统计，自三十年代以来，莎士比亚在汉译西方文学经典中一直位居榜首，有的剧作译本达上百种之多——第二共和前期（1949—1960）出版的莎剧译本已达44种，印数44万余册。

不过，我国学界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绝世名优，长于诗词”的层次，距离林纾所谓莎氏“立义遣辞往往托象于神怪”的看法相去并不太远。莎士比亚不仅是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也是西方思想大传统中伟大的政治哲人之一。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

## 2 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

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从帝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变，却鲜有人看到，莎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政治哲学财富。晚近三十年，我们的莎剧全译本有了令人欣喜的臻进，但我们对莎剧的政治哲学理解仍然没有起步。

西方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解读很多，绝非无书可译。“莎士比亚绎读”系列或采译西人专著和相关文集，或委托青年才俊编译专题文萃，以期增进汉语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品质的认识。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年6月

致伊尔萨 (Ilsa)

## “重启政治哲学”丛书编者序

理性能否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基础，能否指导我们的政治生活，后现代思想对这种可能性构成了挑战。着眼于这一挑战，帕尔格雷夫出版社（Palgrave）推出了“重返政治哲学”丛书。后现代思想的挑战令人振奋，它促使人们重新深入阅读古典文本。这些古典文本的作者不仅有政治哲人，还包括诗人、画家、神学家、科学家以及其他通常不被认作政治理论家的思想者。本丛书所出版的著作勇于重新阅读这些文本，因而有助于恢复公民理性的古典基础。同时，本丛书也推出了那些明辨近代政治理性主义之短长的论著。本丛书各著作的诠释尤其关注历史背景和语言，关注审查迫害和道德问题在具有巨大差异的不同文化之中，如何迫使明智的思想者采取种种不同的写作策略——这些策略使他们能够针对不同的听众、在不同层次上提出那些非同寻常的思考。本丛书对古代、中世纪、近代早期和晚期的著作加以细读。这些著作试图回答关于人类最为深刻和持久的问题，进而阐释人所处的境况，并且（在现代）为当今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奠定基础。

本书有关莎士比亚五部剧作的研读，虽然隐含着对当今与传统的莎士比亚学术研究的广泛了解，但它不同寻常地直接面向政治学、哲学、心理学和宗教学的师生，以及喜爱莎士比亚的普通大众言说。作者对这些剧作的解读博大精深，颇具哲思，将会对文学研究者有所教导并构成挑战。但这种方法并非学术性的，甚至不很合

## 2 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

于“文学”。相反，纵使并非初读，作者仍从一个有思想的读者的角度，从头开始阅读这些剧作，且怀揣着新读者对知识的渴求。这种渴求来自对这些剧作触动人心的深刻，以及对人性的那率直而并不世故的着迷。在序言中，作者提供了这些剧作在历史、哲学、心理学和宗教方面的广阔背景；此后各章 [x] 展示出莎士比亚如何努力解决关于存在的广泛而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基将人们拉回古代经典著作，其意涵则永恒不变。本书认为，莎士比亚的智慧在于，他对充斥在公民、宗教、爱欲和家庭生活中的那些令人痛苦的矛盾冲突，做出了真正具有启发性的分析——这些矛盾冲突仍然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所在，尽管当今社会以那些肤浅的娱乐（是的，还有蒙蔽了诸多学术写作的抽象概念）吸引我们，多多少少掩盖了这些矛盾冲突。因此，这部研读莎士比亚的著作是一篇有关公民—文化复兴的文字。就此而言，它对我们当今公民文化的批评既具洞察力，亦富建设性。

## 序 言

本书解读五部莎剧，以期待这些剧作可以为人类政治生活提供永恒的指导。我选择研习的这几部剧作的主题都在于其政治性。也就是说，这五部剧作不仅描绘社会活动，也刻画政治行为。由此，它们超脱了现代小说作家们大为偏爱的纯然私人的或内在的生活——特别是爱情故事。我之所以选择这些剧作，是因为它们始终不停地关注着某些曾经作为政治之核心与灵魂的问题——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问题会再次成为，或至少被认作政治的核心和灵魂。这些问题就是：谁应当统治？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高尚？什么德性使人配统治，而何种败坏使人不配统治？何为公民或臣民的德性？这些德性和败坏与人的幸福有何关系？这些德性是否为理性所支持？这些德性是否来自对人类生活的某种一贯的理解？正义或任何别的某种德性是否具有神圣的或宇宙性的支持？

莎士比亚的剧作会以一种让细致的研读获得回报的方式探讨上述这些问题，这不该让人感到奇怪。正如尼采所言，我们是“两颊绯红的走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二“论同情”）。我们若没能按照自己关于何为正义、高贵和崇高的意见，也即依照自己的道德意见去生活，就会感到羞愧和内疚。而政治生活一度正是人们争论并实践这些意见的平台。在近代政治哲学出现之前，政治生活远比当今更是一个善恶得以呈现的舞台——在这舞台上，职位会将人彰显。具体来说，在这舞台上，那些唯有在公共意见的明亮、有

德的光线中才能完全发展起来的人的能力，能得以发展起来，并且作为人之存在的精神核心而获得运用。莎士比亚把曾经上过那种完整政治生活的人变成自己很多剧作的主题，因此，他的剧作得以塑造一代代政治家和公民的品味和明智。从这些剧作中，置身于政治中的男男女女找到了伟大政治品格的鲜活例证——这些例子有的健全，有的带着缺陷。比如，马尔巴罗公爵（Marlborough）告诉我们，他对英国历史的理解完全来自莎士比亚，<sup>①</sup>而林肯则发现，《麦克白》完美地描绘了僭政和谋杀。<sup>②</sup>

[2]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剧作已不再成为教育从事政治事务的男男女女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我们来说，情况可能更糟。当阅读这些剧作时，我们甚至会感到，当今政治生活纵使在最好的状况下，也都缺乏我们在剧作每一页所能见到的那种丰富、高超的反思。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在政治上的贫乏，因此，我们较之过去一代代的公民更为需要，也已开始意识到自己更需要阅读莎士比亚的剧作。这些剧作能够给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太能见到的教益：那是关于僭主命运的动人而完整的图景，是关于好的统治者和好的政制之特征、关于朋友间关系、关于公民和臣民之义务的全面展现。当然，我们在剧作中所见到的角色各有其独特的处境、习俗和信念：布鲁图斯（Brutus）是罗马人，而麦克白（Macbeth）是苏格兰

---

① [译注]指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1650—1722）。据说他曾说过“我从莎士比亚那里学习历史”（I take my history from Shakespeare）。

② [译注]1865年4月，林肯在访问弗吉尼亚州点城（Point City）军队指挥部后，同参议员哈兰（Harlan）、萨姆纳（Charles Sumner）及法国贵族德·钱布仑等乘坐“河流皇后”号（River Queen）轮船返回华盛顿。据钱布仑回忆，林肯在船上曾朗读了《麦克白》“与其我们食不安心……再也不能奈何他了”（3.2.17-26）一段。他随后向船上诸人解释说，这是“对谋杀者逼真的描述；阴暗的行为完成了，它折磨着罪犯去嫉妒受害者的睡眠”。可参 David Herbert Donald, *Lincoln*,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p.580。

人。但莎士比亚由这些角色的言行表现出的智慧则是永恒而普适的。他笔下的人物竭力应对的，是任何严肃的人都可能面对的最为深刻的道德和政治问题。随着我们的心智逐渐为这些剧作所打开，我们便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尽管有时以其退化的当代形式呈现出来，却仍然伴随着我们；这些问题永恒不灭。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些剧作中，为它们所打动时，便不得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当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时——按照莎士比亚本人所提出的问题那样——这种充分的意识就能够开始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时代的政治和道德生活。

不过，为了能够利用好莎士比亚给我们提供的机会，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还得接受某些非同寻常的要求。我们要克制自己，勿以当今的想法强加于这些剧作之上；我们必须试着像剧中人物理解其自身那样去理解他们。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并非易事。正如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我们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政制深刻地塑造。因此，想要摆脱自身政制特有的限制，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今日的政制，恰巧在相当程度上由现代政治哲学和当代社会科学所构建。这两种力量充斥并形塑着我们的意见和思想。我们经常使用诸如“自我”(ego)、“身份”、“文化”、“权利”、“自身”(self)、“功能失调”(dysfunctional)、“角色模型”(role model)等词汇，而对其现代源头一无所知，也没有质疑这些词语是否充分符合其所要描述的现象。这些可能成为好事情的来源，也可能妨碍我们去接近莎士比亚这样的思想者的作品，使他的剧作没能成为我们的向导；相反，它们要么被我们自己的词汇和术语所困所限，要么被我们凭借如下信念而自信地加以拒绝：我们身处已被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会不假思索地迅速贬斥任何明显倒退回过去的思想。因此，我打算只是单纯地(naively)贴近莎士比亚的剧作，而不会利用[3]当代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哲学，以及被后现代哲

学思想深刻塑造的当代文本批判理论给我们的思想借来的那些智术之辞 (sophistication)。在适当的时候，我在解读中引入了莎士比亚显然熟悉的一些古代和中世纪文本。

换个有些不同的说法，现代政治哲学学说将我们与莎士比亚的这些剧作隔离开来。因而，我们要理解这些剧作，就需要将此类学说置于一边，或者加上括号。举例来说，我想到了认为或宣称我们针对彼此拥有个人权利的学说；认为人类是所谓“权力”的追求者的学说；认为政府是被统治者为了保护自身权利，通过社会契约或同意而构建的学说；认为政治机构要刻意相互制衡的学说；认为技术是征服所谓无序的自然工具，能提供丰饶物产以资消费，减轻人类的痛苦和劳作的学说，等等。这些学说纵然毫无疑问有益于自由民主国家里男男女女的生活，却与过去所谓的政治生活大相径庭，然而，莎士比亚能够帮助我们复原那种政治生活。

正如我们在《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 中所见，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非常接近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描述：其特征不在于服从君王的命令，不在于不假思索地忠诚于国家或祖国，亦不在于保护并增进自身权利的个人关切；毋宁说，其特质在于对善与恶、正义与不义、高贵与卑贱的共同思考，即在于我们对严肃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在于我们确实共同尊敬那些自己认为值得尊崇和献身之事，并对那些我们认为卑贱可鄙之事感到轻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需要由拥有某些特定德性的公民来精心施以教化，它不是达致其他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所在。政治生活还在于选择具有此种德性的人，并予以支持，使他们领导和统治共同体。政治生活包括了明智、慎思、修辞和灵魂的技艺。在其剧作《尤里乌斯·凯撒》中——此外也包括其他剧作，例如《暴风雨》(*Tempest*) 开场的国家之舟一场，以及《麦克白》中玛尔康

(Malcolm) 与麦克德夫 (Macduff) 之间的谈话——莎士比亚尤其充分而清楚地展现了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这问题就是：谁应当统治？谁配统治？什么德性使一个人有资格领导他人？何种败坏使一个人没有资格居于领导之位，甚至没有资格活着？谁最能引导我们共同实现我们作为公民的目的，而什么人因此在道德上使其他所有人负有服从的义务？

学习政治哲学的学生都非常熟悉，现代政治哲学以何种方式将政治生活——随之也一同将莎士比亚的解释者们用来观看莎士比亚剧作的透镜——逐出上述[4]问题之外。不过，普通读者可能发现，下文对此种变化进程的最突出特征所做的简要概述，对他们会有所帮助。

\* \* \* \* \*

随着关于前政治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的现代学说的出现，“谁应当统治”这一问题便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关于价值与应得以及分配正义的更大问题也被隐去。这一学说的缔造者霍布斯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效果正是他的意图所在，因为他宣称，“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谁是更好的人’这一问题根本没有位置”。他主张所有人在政治上一切重要的方面都生而平等，此后又作了一个足够重要的补充，“或者，即便自然已经使人变得不平等……也必须承认这种平等”。<sup>①</sup>他清楚地表明，之所以要如此假称平等，是为了终结战争，而一切宣称有资格统治的名号 (titles to rule) 通常都会引致战争。必须把宣称有资格统治的名号理解为“虚荣的”东西。它并

---

① 《利维坦》第 15 章，关于第九自然法。强调部分为我所加。

未道出一个人有何真正配统治之处 (worthiness), 相反, 它只是表达了纯粹的虚荣, 即表达了人类所特有而又非理性的、以显赫之物为乐的特征。<sup>①</sup> 为了取代所有这类对统治的诉求, 并找到根除此类诉求的生活方式, 霍布斯为我们提供了自然权利的新学说。这种学说限制了“统治”(government)的目的或意图, 由此带来了某些全新的东西。

要理解这种新学说对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 关键要看看霍布斯如何为自然权利学说奠基, 以及看看遵循此类权利会造成怎样的社会。霍布斯主张, 在驱使着我们的诸多主观激情之中, 有一种对暴死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不可抗拒, 所以我们会不自禁地受其驱使以保全自身。既然我们不可避免会有这种恐惧, 并且受其驱使而行动, 那么我们的这些行为就不应受到谴责。因为正义不能要求我们做不可能之事。于是, 我们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前, 就凭自然而拥有一种正确/权利(right), 可以去做出于对暴死的恐惧而做的所有的事。<sup>②</sup>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能自私但正当地宣称自己有着拥有一切的权利。当我们努力要摆脱每个人都拥有如此无限权利而导致的糟糕状态时, 我们就进入了公民社会。我们同意放弃对万物的自然权利, 以确保我们能够得到我们共同需要的某些东西, 并免于他人的威胁。我们在这些“权利”或诉求上达成妥协, 以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和平中得以保全。

---

① 见《利维坦》第17章的“为什么某些没有理性和语言的生物, 却能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保持群居生活”一节(麦克弗森[MacPherson]本, 页225-226)。可参照第13章(页185)及第14章的“誓言的终结”(页200)。

[译注] 麦克弗森本指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编辑的《利维坦》, 1982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此书页边附有概述相关段落的简短文字。本文所引各章下的文字, 就是这类文字。

② 《利维坦》第18章(麦克弗森本, 页234), 可参照第13章(页184-185)。

公民社会以确保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基础形成，这意味着我们并非认为自己想要设立一名“统治者”。相反，我们会签订协议，设立一名主权者，向我们自己来代表我们（represent us to ourselves）。这个主权者会使我们想起自己对暴死的恐惧，提醒我们为了避免死亡需要和平行事，而不是爱慕虚荣。由我们拥立来代表我们自己的那个人——或那群人——可能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在目的或意图方面则彻底受到制约：是为了保护权利，从而确保和平，或者说，[5]是为了保证公民能够舒适地自我保全。主权者治理（governs），而非统治（rule）。他就像轿车或卡车的变速器（governor），并不引导我们转向目的，而只是让我们个人的、主观的、任意的、激情的追求处于合理限度之内。事实上，只要法无禁止，我们皆可自由（liber）行事；法律既没有，也不能正当地命令我们献身于所谓的共善（common good），或致力于培育德性或卓越品质。正如克劳特（Richard Kraut）所言，个人权利的目的在于保护我们不受他人需要的影响，或者说，在于“开辟出一块地方，使人们在其中可以免除不得不为共善作贡献的义务”。<sup>①</sup> 不可抗拒的恐惧被认为授予了心怀恐惧者无可指责的权利，这种权利在自然状态下普遍有效，不受限制，而唯有恐惧所引起的精于算计的理性所假想的结论，也就是法律，才能对其有所制约。霍布斯想要以其“勿施于人”（do not do unto others）这一所谓人的法则取代福音书“施

---

<sup>①</sup> Richard Kraut, “Are There Natural Rights in Aristotle?”, *Review of Metaphysics* XLIX.4 (June 1996), 763. 关于统治与治理的差异，可见 Harvey C. Mansfield, Jr., “Hobbes and the Science of Indirect Government,” *APSR* 65 (March, 1971) 97-110; Clifford Orwin, “On the Sovereign Authorization,” *Political Theory* III.1 (February 1975), 26-52; Francis Slade, “Rule as Sovereignty: 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 *The Truthful and the Good.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Sokolowski*, John J. Drummond and James G. Hart, e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159-180.